



探索食物传播 洞悉文明流变

——读《沙漠与餐桌：食物在丝绸之路上的起源》

□ 霜枫酒红

谷物、水果、坚果、茶叶、芝麻、花椒……今天全世界广泛消费的这些食物都有着令人惊讶也容易被忽视的过往。在“熟视无睹”的背后追溯食物历史时，可以走进不同的地理单元，并发现众多食物都是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世界各地厨房的，同时这些食物也是载体——传播着思想、文化并影响着人类的文明进程。环顾我们的四周就会发现，至今这种食物流动与改变依然没有停止，而且继续丰富着人类的生活。

探究这一变化的美国学者罗伯特·N. 斯宾格勒三世完成了《沙漠与餐桌：食物在丝绸之路上的起源》（以下简称《沙漠与餐桌》）一书。该书综合考古学、植物学和历史学等证据，讲述了古代的农业生产者如何培育出我们今天享用的食物，以及它们如何沿着丝绸之路以及比丝绸之路更古老的道路传入世界各地的往事，引领读者跨越中亚、西南亚、南亚、东亚、欧亚大陆甚至是美洲和西半球的广大地域追根溯源，挖掘分析还原谷物、豆类、水果、坚果、蔬菜、香料、油和茶的起源和传播历程，说明丝绸之路在食物的进化和传播中的非凡作用。

《沙漠与餐桌》开篇就说，“将历史拆解为最简单的元素，我们会发现古代和现代的植物栽培与基因流动的过程十分相似。

沿中亚贸易路线进行的交流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但其最本质的内涵是对异国产品的渴望，卡尔·马克思称之为‘商品拜物教’：人们愿意付出天价去购买邻居没有的商品。”作者认为，无论在现代还是古代，商品拜物教和炫耀性消费都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在古代或许比现代更甚）。古代世界的交流网络使不同人群互联互通，也影响了不同人群的行为、观念。

就人类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丝绸之路作为器物之路、贸易之路、宗教之路的意义已经广为人知，但有关农作物和饮食文化交流的历史仍然处于零散的“讨论状态”，大多作为论文或者专著中的章节甚至段落而出现。就此而言，《沙漠与餐桌》系统地探讨“食物在丝绸之路上的起源”，提供了丝路文明研究的新视角，为读者打开了丝绸之路的食物聚宝盆，增长历史学、植物学新认知，也为人类祖先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探索而震撼。

粟米是中国北方人最常见的食材之一。这种朝夕相伴的粮食何时何地被人驯化？经历了一次还是多次驯化？为什么粟的野生祖先或亲本种群从未被发现过？粟应归为单系群还是多系群植物？在书面记载出现前其物种是如何跨越亚欧两大洲传播的？《沙漠与餐桌》说，“黍和粟这两种农作物都发轫于中国北方，与人类的关系源远流长”。作者分析了黄河流域多个考古遗址出土的粟米，引用了稳定碳同位素研究、微体植物遗存研究、淀粉粒研究等量化成果，判定粟沿着丝绸之路西行，最终成为罗马帝国及至整个欧洲的主要农作物之一。作者说，“小小的粟米牵引着罗马帝国战车方向，也喂饱了整个东欧。粟米养育了丝绸之路沿线奔波

的人和整个亚洲的‘游牧民族’。”

《沙漠与餐桌》一书也重点探究了“小麦之路”。小麦是全球居民家中举足轻重的食物，它“如何、从何地、在何时传入中国并最终成为中餐和中国农业的核心组成部分”？作者经过分析判断，“大约1万年前，小麦在新月沃土被人类驯化；早至公元前6000年，几种不同形式的小麦便传播到了遥远的土库曼斯坦；而在古代最终进入中国的，似乎只是易脱粒普通小麦。”也就是说小麦与粟米的传播方向相反，进入中国后“被用于制作面条和饺子，对中国人的饮食产生了显著影响”。

《沙漠与餐桌》对多种水果的传播进行了分析。作者说，作为人类最初违反上帝命令的象征，欧洲传统的神话与观念对苹果是很反感的。苹果如今已经洗去污名，成为我们喜爱的“水果之王”。《沙漠与餐桌》说，重新认识苹果，就是从丝绸之路开始的。苹果树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亚，而现代商业种植的苹果与哈萨克斯坦旧都阿拉木图郊外真正的野生苹果种群之间存在遗传连锁关系。“事实上，丝绸之路正是现代苹果诞生的功臣——我们所熟悉的苹果是4个各不相同的种群杂交而成的。当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带着苹果的种子横穿欧亚大陆时，这些种子孕育的果树与在最近一次欧亚大陆冰河期之后便与外界隔绝的当地种群进行杂交，由此诞生了能够结出更多、更硕大的果实的后代。”

《沙漠与餐桌》说，桃起源于中国长三角流域的浙江沿海一带，在古希腊时期传入欧洲。桃的古拉丁文意思是“波斯苹果”，这种命名法说明了桃这种水果在古代波斯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沙漠与餐桌》指出，桃

并不是唯一跨越漫漫丝绸之路的水果。出使西域的张骞在公元前2世纪晚期再次率领使团前往中亚，他从中亚带回一小截卷曲的葡萄藤蔓，一路装在生皮袋里，以免在沙漠中遭受烈日的炙烤。作者说，司马迁《史记》笔下葡萄以及用葡萄酿制的甜酒是从大宛传入中国的，后世大部分史学家认为大宛就是现代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

这些粮食、作物、水果传播的过程，始终伴随着人类的活动。帝国的扩张、军队的调动、殖民的开垦以及成千上万商人和牧民的足迹，他们随身携带的遗传物质催生了许多动植物的新品种，进而推动了农业革命和技术革新。诸如轮作制度就是一项农业重要举措，增加了粮食供给，确保了欧洲和亚洲各大帝国的繁荣发展。

“一份酥皮黄桃派或者一杯葡萄酒都是考古文物，水果的基因里记载着一段段始于遥远过去的故事。世界各地的学者都在努力解读这些记载，以此了解人类与现代表世界的植物品种如何共同进。”《沙漠与餐桌》将不同种类的粮食作物串连起来研究分析，不仅是向读者介绍食物本身及其传播过程，更是在揭示这些传播过程所体现的人与人的联结——新的食物种类诞生于旧品种的内部，人与人交往交流带动世界各地饮食的塑造。

“了解身边食物的起源让我们与自己的历史联系更加紧密”。落脚到历史上的草原丝绸之路城市大古都大同，今天在大力发展文旅产业、打造“美食之都”，或许更应该关注一下过去若干个世纪里当地农作物和美食经由丝绸之路的传播与流变——洞悉文明的进步将能更好地迎接未来、开创新风景。



多读书更要解其意

□ 杜永红



日子，有时浓得化不开。时间像母亲手里的汤匙，把浓得化不开的日子搅拌匀、搅拌淡。日子太浓，食而不化；日子太淡，容易空……空了，就需要精神食粮来填补。

书就是垫补空虚的食粮。“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那倒不至于，但面黄肌瘦、面容憔悴总是有的。翻一翻书页，平淡的日子，有真常之趣。空虚的日子里，需要大部头来充实。大部头里真的能找回踏踏实实岁月。

读了墨子《染丝》，你就不再因“墨子泣丝”这个偏执的典故而悲愤，因为丝染成什么颜色关键在“所染当”。战国够乱吧，而墨子短褐穿结、草履奔走，止战扶弱。墨子能自渡亦能渡人。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我相信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们缺的不是舟楫，而是渡河的勇气。我们欲望过剩，却失却了溯洄游之、追寻彼岸幸福的力量。

甚至大多时候，我们故意混淆欲望与力量的概念，将二者颠倒，错把欲望当作力量。“公欲渡河”，怀私者以为渡己，大公者认定是渡人。其实，渡己与渡人没有区别，己亦是人，渡不了己，又怎能渡人？一首短诗，就能将我从世俗的泥沼里超拔而出，清欢度日。

董仲舒之《举贤良对策》，使我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生出更深的敬意。历史上，每留下浓重一笔，就须付出毕生精力，冒着生命之虞。极权喜欢，会说董仲舒有忧患意识；极权厌恶，便说董仲舒妄言灾祸。于是，董仲舒下狱。于是，世人崇拜无舌之鱼。

听一听朱载堉《山坡羊·十不足》吧。三餐吃饱思车马，出入车马思做官，阁老谋权又篡位，坐上皇位想长生……不足、不足、不知足……“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还嫌低。”知足常乐、知足者智。知足还远不如“知止”，“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里的话总是简单到深刻，深刻到点醒执迷不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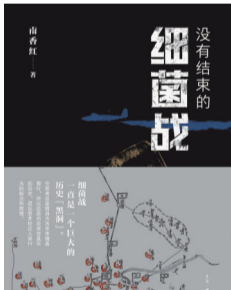
读书，有“补白”之用。一本年代久远的书，常能警醒世人：真常处世。

忆及少年，我的课本总会卷起书页，真和牛汉《我的第一本书》里所描写的残书一个样，但又不一样。牛汉那个时代，书籍匮乏，而我这个时代，书籍唾手可得。按理说，我们都该是这个知识爆炸时代的饱学之士，然而，书籍浩如烟海，读者寥寥，著文以自娱者更是屈指可数。但这可数无几，恰如夏日草丛中零星绽开的蒲公英、碎黄花。有了这些明艳的黄花，草丛一下子显出清新脱俗。



这部非虚构纪实作品，以5部分、22章共60多万多字的篇幅，呈现了一群遭受日本细菌战侵害的中国普通老百姓两三代人、几十年里未曾疗愈的历史伤口。作者花了数十年的时间，一直跟随细菌战受害者后人王选，对细菌战的控诉及受害群体做了深入调研与探访。在大量真实、准确、可靠的史实、史料和第一手访谈资料的基础上，以王选多年的调查、追踪与纪实为主线，真实再现了历时80来年历史的众多细节与不为人知的真相。

作者南香红，新闻工作者，非虚构作家。著有非虚构著作《王选的八年抗战》《野马的故事》等。



《没有结束的细菌战》

茅盾文学奖作家苏童的亲选小说集，收录他的17篇代表性小说，包括《西瓜船》《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吹手向西》以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茨菰》等。17个直呼真实的成长与挣扎故事，写尽命运巨流里普通人的横冲直撞。每一个把痛苦当笑话讲的人，都能在书中找到灵魂共鸣。

作者苏童，学者、作家。主要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妻妾成群》《红粉》《罂粟之家》等；长篇小说《米》《我的帝王生涯》《河岸》《黄雀记》等；另有《西瓜船》《拾婴记》《白雪猪头》《茨菰》等百余篇短篇小说。



怪不得余华多次推荐！

苏童 著 余华《巴黎评论》推荐 茅盾文学奖得主苏童短篇小说

《西瓜船》